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华佛教史



总主编
季羡林
汤一介

中韩佛教交流史卷

魏常海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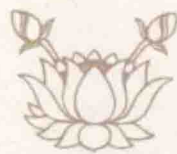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华佛教史

中韩佛教交流史卷

魏常海 著



总 主 编
季 羨 林
汤 一 介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华佛教史. 中韩佛教交流史卷 / 季羨林, 汤一介
主编; 魏常海著. —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14.5
ISBN 978-7-5440-5935-0

I. ①中… II. ①季… ②汤… ③魏… III. ①中韩关
系—文化交流—佛教史 IV. ①B9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69858号

书 名 / 中华佛教史·中韩佛教交流史卷
作 者 / 魏常海

出 版 人: 荆作栋
总体设计: 崔元和
编辑主持: 雷俊林 刘立平 杨 文
责任编辑: 李梦燕 贾云飞
复 审: 潘 峰
终 审: 刘立平
装帧设计: 王耀斌 陶雅娜
印装监制: 郭 勋 贾永胜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教育出版社
(地址: 太原市水西门街馒头巷7号 电话: 0351-4729801 邮编: 030002)
印 装: 北京图文天地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7.75
字 数: 297千字
印 数: 1—5 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440-5935-0
定 价: 58.00元



《中华佛教史》总序

◎季羨林

此丛书名曰《中华佛教史》，为什么我们不按老规矩，称此书为《中国佛教史》呢？用意其实简单明了，就是想纠正一个偏颇。我们惯于说中国什么史，实际往往就是汉族什么史。现在改用“中华”这个词，意思是不只汉族一家之言，而是全国许多个有佛教信仰的民族大家之言。

谈到中华佛教史，我们必须首先提到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此书取材丰富，分析细致，确是扛鼎之作，已成为不朽的名著。但是，人类社会总是在不停地前进，学术也是日新月异，与时俱进。到了今天，古代西域（今新疆一带）考古发掘随时有新的考古材料出土，比如，吐火罗语就是在新疆发现的，过去任何书上都没有这种语言的记载。所以我们感觉到，现在有必要再写一部书。

在中国古代佛教的著述中，有几种实际上带有佛教史的性质，比如《佛祖历代通载》等。佛教以及其他学科而冠以史之名称（如文学史之类），是晚近才出现的，其中恐怕有一些外来的影响。

近代以来，颇有几种佛教史的著作，这些书为时代所限，各有短长，我在这里不一一加以评论。

我们现在有胆量写这一套中华佛教史，就是为了赶上学术前进的步伐。

总而言之，归纳起来我们这套书有几个特点：第一，就是我们不只说汉族的事情，也介绍我国其他有关的少数民族的情况；第二，我们对古代西域佛教史的发展有比较详细的论述；第三，现在写这部书不仅有学术意义，而且还有现实意义。佛教发源于印度，传入中国后，经过两千多年的

演变，最终已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在现实生活中，佛教仍然是一个有生命的团体。中国人民不管信佛教与不信佛教的，都必须了解佛教的真相，这会大大地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

在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世界各国对中国人民精神生活的了解。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正是中外互相了解，全世界都互相了解。

我是不信任何宗教的，但是，对世界上所有的堂堂正正的宗教，我都有真挚的敬意。因为这些宗教，不管它的教义是什么，也不管它是如何发展起来的，这些宗教总是教人们做好事，不做恶事，它们在道德上都有一些好的作用。因此，现代世界上，宗教的存在有它的必要性。专就佛教与中国而论，佛教的原生地印度和尼泊尔，现在佛教已经几乎绝迹，但在我们中国，佛教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原因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大度包容。中华民族文化之所以达到今天这样如火如荼的程度，就是因为我们的民族有这种特点。从当前世界来看，我们最近提出了和谐世界的概念，这就希望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之间互相了解，互相促进，共同达到人类社会更高的层次。

所以，我们研究佛教写佛教史，不但有其学术意义，还有更深刻的现实意义。



目 录

第一章 中韩文化交流概说	1
第一节 古朝鲜、箕子朝鲜及汉武帝设郡	1
第二节 半岛三国与汉唐文化	4
第三节 高丽王朝与宋元文化	14
第四节 朝鲜王朝与明清文化	23
第二章 东晋时期中国佛教初传海东	35
第一节 前秦佛教东传高句丽	35
第二节 难陀自东晋赴百济传法	37
第三节 阿道奠基新罗佛教	39
第三章 南北朝、隋时期海东三国僧人入华请益	43
第一节 义渊北齐问道	44
第二节 高句丽僧朗齐梁学道弘法	46
第三节 高句丽僧波若等陈隋学法传道	48
第四节 百济僧玄光入陈学法（附：发正、谦益）	51

第五节	新罗圆光西学入陈（附：觉德、明观、智明、昙育、缘光、安舍、安弘）	55
第四章	唐朝与新罗的佛教交流	63
第一节	新罗慈藏入唐学法（附：圆胜）	64
第二节	净土教之传入新罗	71
第三节	密教之传入新罗	75
第四节	赤山新罗法华院	79
第五节	地藏与九华山	82
第五章	新罗在唐名僧圆测的唯识学	85
第一节	圆测生平事迹	85
第二节	圆测现存著述及其唯识学特点	92
第三节	圆测与新罗的唯识学	101
第六章	新罗名僧元晓与中国佛教	105
第一节	元晓生平事迹	105
第二节	元晓的“和诤”思想与中国佛教	108
第三节	《起信论》慧远疏、元晓疏、法藏疏的比较	113
第四节	元晓佛学在韩国、中国及日本的影响	123
第七章	新罗名僧义湘入唐学华严	129
第一节	义湘入唐经过	129
第二节	义湘回国后的传教创宗活动	132
第三节	法藏与义湘的通信	134
第四节	义湘的华严学	137
第五节	义湘的弟子	140

第八章	唐五代禅宗与新罗禅门	143
第一节	新罗王子无相来唐求法弘禅	144
第二节	法朗、慎行入唐与新罗禅宗曦阳山派的创立	148
第三节	西堂智藏与新罗禅门迦智山派、实相山派、桐里山派的创立	153
第四节	沧州神鉴与新罗慧昭	159
第五节	麻谷宝彻与无染之圣住山派	160
第六节	章敬怀晖与新罗禅门凤林山派	166
第七节	南泉普愿与新罗禅门师子山派	169
第八节	盐官齐安与新罗禅门闍崛山派	171
第九节	仰山慧寂与新罗瑞云顺之	176
第十节	曹洞宗东传与新罗禅门须弥山派	181
第十一节	石霜庆诸禅法在海东的传承	185
第十二节	投子大同与海东璨幽	189
第十三节	永明延寿与法眼宗东传	190
第九章	义天入宋求法与高丽教宗的振兴	192
第一节	义天入宋前后经历	193
第二节	义天的“圆融”佛学观	196
第三节	义天与中韩华严学的复兴（附：均如、坦文、决凝、乐真、澄俨、宗璘、教雄）	200
第四节	义天与海东天台宗的创立（附：谛观、义通、教雄、义璇）	206
第五节	义天与高丽唯识学的传习（附：鼎贤、海麟、韶显、惠永、海圆）	214
第六节	义天的编藏事业	218

第十章 高丽知讷对中国禅的继承与发展	221
第一节 李资玄、坦然的禅学	221
第二节 知讷的生平	222
第三节 知讷对中国禅的传承创新	224
第四节 知讷法嗣慧湛的禅学（附：冲止）	234
第五节 知讷著作在中国的流通与影响	237
第十一章 元代临济禅与高丽求法僧	240
第一节 绍琮赴高丽弘法	240
第二节 普愚入元参清珙	241
第三节 普愚的禅学思想	244
第四节 慧勤入元谒指空、处林	245
第五节 慧勤的禅学思想	248
第六节 自超、智泉入元师事指空、慧勤	250
第七节 千熙入元参万峰时蔚	252
第八节 元朝喇嘛教之入高丽	253
第十二章 临济宗在朝鲜王朝的传演	255
第一节 临济法裔休静的事迹	256
第二节 休静的思想和宗风	258
第三节 休静的门人	261
第四节 临济法裔浮休善修、碧岩觉性	266
参考文献	269
后记/魏常海	272
《中华佛教史》后记/汤一介	274

第一章

中韩文化交流概说

第一节 古朝鲜、箕子朝鲜及汉武帝设郡

中国和韩国朝鲜半岛地理上唇齿相依，历史上关系密切，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自古以来就十分频繁和深入。这种交流是双向、互动的，中国文化固然对韩国朝鲜半岛的文化产生过久远而深刻的影响，但与此同时，中华民族受韩国朝鲜半岛文化的影响也颇多。并且，中国文化传入韩国朝鲜半岛之后，就不再是简单的延续，它必然会和半岛的社会情况及文化传统结合起来，多少改变了原来的面貌，变成韩国朝鲜半岛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同印度佛教传入中国而变成中国佛教一样。

中韩两国佛教的交流，是在中韩两国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因此，本章先对两国文化交流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对以儒释道为主的传统思想文化的交流，作一个概况的论述。

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表明，朝鲜半岛（韩半岛）在距今四十万年乃至六十万年前，就已经有人类生存，他们和其他许多古老民族的先民一样，也经历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等漫长的发展和进步过程。韩（朝鲜）民族有着不同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历史，传统习俗等方面也与中华民族有所不同，有本民族自己的文化特质。关于朝鲜民族（韩民族）的起源，在13世纪高丽时代的一然禅师所

著《三国遗事·古朝鲜》中，就记述有檀君开国的神话。《三国遗事》引《魏书》说：“乃往二千载，有檀君王俭，立都阿斯达，开国号朝鲜。”

据说这位古朝鲜的开国者檀君，是天帝桓因的庶子桓雄的儿子。桓雄“数意天下，贪求人世”。桓因便让他带着三个天符印，率领三千天兵天将，降到太伯山顶的神檀树下，“凡主人间三百六十事，在世理化”。当时有一熊一虎，同穴而居，再三祈请天神桓雄把它们变成人。于是桓雄给了它们一把灵艾和二十头大蒜，对它们说：“尔辈食之，不见日光百日，便得人形。”它们遵嘱吃完了灵艾和蒜，开始过起不见天日的生活。但老虎忍耐不住潮湿阴暗的环境，不几天就跑出洞见了阳光，所以未能如愿变人。熊则谨守着桓雄规定的条件，坚持不见阳光，到第二十一天，提前变成了熊女。这熊女与桓雄结合，生下一子，就是檀君王俭，也就是古朝鲜的开国之君。

这个神话传说反映了韩民族祖先的敬天思想和图腾崇拜。熊女之说可能出自北方民族的图腾。北方民族的图腾动物有熊、狼、虎、鹭、鸦等等，其中以熊的崇拜最为普遍。

据说，当中国的尧即帝位的第五十年，檀君王俭在朝鲜称王，定都平壤，后又移都于白岳山阿斯达，御国一千五百年。后来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檀君乃移于藏唐京。后还隐于阿斯达为山神，寿三千九百八岁”^①。

檀君神话，无其他史料可考，而箕子封于朝鲜的传说，则见于中国的史书。《史记》说，箕子是殷商末朝纣王的叔父。纣王无道，杀戮忠臣，箕子谏而不听，“乃佯狂为奴，纣又囚之”。不久，周武王起来“革命”，伐纣成功，“释箕子之囚”^②，又请箕子作《洪范》九畴，以明彝论攸叙，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③这是有关古朝鲜的最重要的传说之一。

《汉书·地理志》也记载说：“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并制定了八条法律：“相杀以当时偿杀；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虽免为民，俗犹羞之，嫁取无所讎。是以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

①《三国遗事·古朝鲜》。

②《史记·殷本纪》。

③《史记·宋世家》。

如果箕子封于朝鲜的传说是真实的，那么这应当是公元前10世纪的事情。由此可以推想，在箕子封于朝鲜之前，中国已与古朝鲜建立了联系，否则不可能把他分封到那里。考古学证明，在公元前10世纪，朝鲜半岛的确已与中国有密切联系，例如那个时期已具有共同的所谓“巨石文化”。朝鲜半岛发现的那个时期的墓葬石棚（支石墓），分为北方式和南方式两类。北方式分布于半岛中部和北部，与中国辽东半岛发现的石棚属于同一种形式。南方式分布在半岛南部，与中国辽东半岛南端的大连和山东半岛发现的石棚基本一致^①。

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中国处于战国时代，许多中国人流亡到朝鲜半岛，带去了大陆的铁器文化。由于铁器文化的传入，古朝鲜出现了铁制的剑、铍等武器和铁制的锹、犁、镰等农具，战斗力和经济力大为提高；与此同时，还有大量的青铜器物，有些是由中国直接传入的，有些则经过古朝鲜人改造而带有了自己民族的特色。这些铁器、铜器文化又进而传到日本，促成了日本的弥生文化。

秦末战乱，中国的燕、齐、赵等地有多达数万的流民避往朝鲜。汉初，燕王卢绾惧怕汉的压力，叛汉投奔了匈奴，燕王的部下卫满（或称魏满）则“聚党千余人”，亡命朝鲜，当时的朝鲜王准（箕准，据说是箕子后代）让他充任北方的防卫。随着大陆移民的增多，卫满聚成了一大势力，于公元前194年驱走准王，自立为王。他依靠中国先进的铁器文化，统治了古朝鲜。卫满建立的国家，史称卫满朝鲜。

到卫满之孙右渠王时，因其阻碍汉朝与古朝鲜的南部部族通交，卫满朝鲜同汉朝发生了冲突。公元前109年，汉武帝派六万陆军和七千水军进攻卫满朝鲜的首都王俭城，第二年灭卫满朝鲜，于是，在古朝鲜的原属地设置了乐浪、真番、临屯、玄菟四郡，郡下置县，建立起汉朝的统治体制。到公元前82年，真番、临屯二郡即行废止，玄菟郡迫于高句丽部族的压力，也于公元前75年把郡治远迁北方，古朝鲜的境内就只剩下乐浪郡（郡治在今平壤乐浪区）了。乐浪郡设置了四百余年，到公元313年，终于被高句丽的势力占领。

古朝鲜时期，朝鲜半岛南部还有许多部族，后来逐渐形成了三个部族联盟，这就是马韩、弁韩、辰韩，即所谓“三韩”。马韩在汉江流域以南的西半部，辰

^①参见周一良《中朝人民的友谊关系与文化交流》，开明书店，1951年；池明观《韩国文化史》，高丽书林（日），1979年。

韩在洛东江之东，弁韩在洛东江之西。三韩大体是北方移民与当地部族结成的部落联盟，其中马韩的势力最大，常常可以决定辰韩、弁韩的首领。《三国遗事》引《魏志》说，卫满占据古朝鲜时，“朝鲜王准率宫人左右越海而南至韩地，开国号马韩”。辰韩中有一部分原来是中国秦朝人，因为避秦苦役，所以流亡到三韩地域，他们带去了中国文化，与当地人联结成一体。几百年后，其语言中仍保留着中国语言的习惯，所以辰韩“或名之为秦韩”^①。弁韩可能有乐浪设郡时的移民，其地有辰韩人杂居，所以也叫弁辰。弁韩加耶地区发现的金海贝冢中，有汉元凤元年（前79）铸造的货泉（钱币）一枚，还有纺锤车、琉璃玉、少量石器和大量的铁刀子，说明当时铁器已经被广泛使用。另外，在那里还发现了一把炭化米，这就是韩国最早的金海米。加耶文化或金海文化，带有当地文化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特点，例如金海土器，就是原来的土器与中国式灰陶技术相结合而成的红色或青灰色土器。

第二节 半岛三国与汉唐文化

公元前57年至公元935年间，朝鲜半岛（韩半岛）有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并立，是朝鲜半岛（韩半岛）的三国时期。高句丽本是中国东北地方的一个部族，汉武帝设郡时，属玄菟郡所辖。汉孝元帝建昭二年（前37），其首领朱蒙开国称王，定都卒本（或谓纥升骨城，今辽宁桓仁）。朱蒙死后被尊称为东明圣王。东明圣王之子类利（琉璃明王）继王位后，又迁都尉那岩城（今吉林集安）。高句丽的势力逐渐扩大，到北魏时，已统治了今中朝界河两岸的广大区域。到长寿王（413—491）时，高句丽首都移到了古朝鲜旧都平壤（427）。

百济始祖是温祚王，他是高句丽东明圣王的次子，他于前汉成帝鸿嘉三年（前18）率领一批臣民到达汉江流域，在汉城附近的慰礼城（广州）定都称王，国号初为十济，后改为百济。到古尔王（234—286）时，他统治了原马韩占据的整个地域。

^①《后汉书·东夷传》。

新罗是由辰韩发展起来的，传说其始祖姓朴，名赫居世，前汉孝宣帝五凤元年（前57）即位称王，国号徐那伐，以金城（今庆州）为都城。到智证王四年（503），才正式定国号为新罗。此后逐渐强盛起来，在六世纪中叶统一弁韩，占据了整个洛东江流域。662年又依靠唐朝力量灭掉百济，668年又灭高句丽，实现了三国的统一。大同江以北的高句丽旧领域内，曾建有渤海国，受唐朝控制。

新罗后期发生战乱，9世纪末和10世纪初，先后有甄萱建立后百济国，弓裔建立后高句丽国（后改国号摩震，又改为封泰），形成了短暂的后三国时代。直到918年，王建取代弓裔建高丽国，935年和936年新罗、后百济降服，朝鲜半岛才建立起统一的高丽王朝。

有关三国的史料，今天保存下来的不多。据说三国都曾编纂过自己的史书，高句丽在建国之初即编写《留记》，后来编成百卷，大概是大事记那样的东西。高句丽末期又有《新集》五卷，是在《留记》基础上写成的高句丽史书。百济在近肖古王时代（346—375）编纂了《书记》，后来又有《百济记》、《百济本纪》、《百济新撰》等。新罗也在545年奉王命编纂了《新罗史》。

但是，所有这些三国时代编写的史籍全都没有保存下来，大概是毁于战火了。今天尚存的有关三国的最早的历史书，是高丽时代金富轼撰写的《三国史记》（1145年）和一然禅师的《三国遗事》（1275—1281）此外就是中国史书中的有关记述。不过，近几十年来考古方面的成就，对研究三国文化很有帮助。

三国之中，高句丽地理位置距中国最近，所以汉文化最先传入。汉武帝时，即设置了“汉四郡”，可以想见，中国的文物制度与儒学思想，那时已开始起主导作用。据《三国史记》记载，高句丽在“国初”就已经使用汉字，第二代王琉璃王（前19—19）还创造了四言汉诗：“翩翩黄鸟，雌雄相依，念我之独，谁其与归？”这与《诗经》中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体十分相似。到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372），即“立太学、教育子弟”^①。太学是当时儒教教育的最高学府，所授内容为五经三史之类。儒学影响在高句丽相当广泛，据《旧唐书·东夷列传》所载，高句丽“俗爱书籍，至于衡门厮养之家，各于街衢造大屋，谓之庑堂。子弟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曄《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春秋》、《玉篇》、《字统》、

^①《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

《字林》，又有《文选》，尤爱重之”。与此类似的记述又见于《唐书·东夷列传》，其中说：高句丽“人喜学，至穷里厮家，亦相矜勉，衢侧悉构严屋，号扃堂，子弟未婚者，曹处诵经习射。”由此可见，高句丽的学制，有为贵族子弟所设的太学，又有一般平民读书的扃堂，二者皆以儒家学说为主要教材。

据《旧唐书》记载，高句丽后期，地方村落中“造大屋”、“设扃堂”，大概是民间办的学堂，教平民子弟读中国儒家典籍。可见，当时汉文化在高句丽已经相当普及和深入。

到7世纪中叶，高句丽更加积极地吸收唐朝先进的文化，还派遣留学生赴唐，入“国学”学习，由唐朝直接培养精通中国文化的人才。

372年，中国前秦王苻坚遣使送名僧顺道携带佛像、经文到高句丽，从此，高句丽开始建佛寺，传播佛教。佛教传入高句丽之后，得到国家和贵族的支持，并和本土祭天敬神的古俗结合起来，迅速在全国得以普及。高句丽僧人又到百济、新罗以及日本传法，对佛教在东亚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高句丽末期，中国道家思想和道教传入朝鲜半岛。《三国遗事·宝藏奉老》说：“《高丽本纪》云：丽季，武德、贞观间，国人多奉五斗米教。唐高祖闻之，遣道士，送天尊像，来讲《道德经》，王与国人听之。即第二十七代荣留王即位七年、武德七年甲申也。明年遣使往唐，求学佛老，唐帝（高祖）许之。”这是说，高句丽末期，唐武德、贞观年间（618—649），中国的五斗米教已经传到了高句丽，并且在民间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唐高祖得知这种情况后，便派遣道士送去天尊像，宣讲《道德经》，更促进了道教在高句丽的发展。第二年，荣留王又派使者赴唐求学佛老，得到唐高祖的支持和鼓励。

五斗米教是汉末张道陵所创，其教是宣传以祷请之法给人治病。把病人姓氏及本人悔罪之意写在纸上，一式三份，一份送上天即放在山上，一份埋于地，一份沉之水，叫作“三官手书”。据说这样就可以把人的病治好。要学此道，需出五斗米，所以称为五斗米教或五斗米道。此道最初在蜀中流行，张道陵之后，张衡、张鲁继续传其道术，造成广泛影响，以后历代皆有信奉者。高句丽人争相信奉五斗米道，大概是与其传统的神仙信仰有关系。

此后不久，高句丽宝藏王时，权臣盖苏文又正式提议高句丽兴道教。《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载，宝藏王二年（643），盖苏文向宝藏王进言说：“三教譬如鼎足，阙一不可。今儒释并兴，而道教未盛，非所谓备天下之道术也。”因此他请

求遣使入唐，“求道教以训国人”。宝藏王很赞成他的主张，就派遣使者，奉表入唐陈请。于是，唐太宗“遣道士叔达等八人，兼赐老子《道德经》”。宝藏王非常高兴，以贵宾之礼厚待叔达等道士，并把他们安置在佛寺中，改佛寺为道观，使道士坐儒士之上，开始宣讲道教，从此道教信仰超过儒、佛。

《三国遗事》也记述了这件事情，其《宝藏奉老》一节中说：“及宝藏王即位，亦欲并兴三教。时宠相盖苏文，说王以儒释并炽，而黄冠未盛，特使于唐求道教。”《三国遗事》中还说，当道教传到高句丽时，曾有盘龙寺普德和尚多次提出反对意见，认为传道教是“左道匹正，国祚危矣”。但宝藏王没有听取他的意见，他便隐居到深山里去了。从此，道教在高句丽传播开来，道士除讲解道教经典外，还举行各种斋醮，行镇国之术，镇护国家名山大川。

中国艺术对高句丽的影响，可以从出土的古坟壁画中窥知。壁画大致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4世纪末到5世纪的作品，分布在东北地方南部、乐浪故地和今平壤周围。内容多是社会风俗画、生活风俗画，图案画和神灵画，与中国的古墓壁画类似。例如，其壁画中表现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形象的四神图，在从6世纪后期到7世纪末的高句丽古坟中，常常占据主壁的地位，而在中国的汉代墓葬里就已经发现了同样的四神图。

百济的开国之王温祚王本来是高句丽始祖东明王的王子。既然高句丽“国初”使用汉字，第二代琉璃王（温祚王之兄）又作汉诗，那么就可以设想，当温祚王带大批高句丽臣民南迁而建百济国时，汉字和汉文化也必定同时传到了百济。儒学传入百济，始于百济建国之初，到3世纪后半期，儒学教育得以完备，并设五经博士之职。百济的儒学盛况，并不逊于高句丽。据《旧唐书·东夷列传》所载，百济“其书籍有五经、子、史，又表、疏并依中华之法”。此外，百济儒学对日本的影响颇大。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所载，3世纪后期，百济阿直岐使日，并传汉学。其后不久，博士王仁赴日，向应神天皇献《论语》和《千字文》，儒家经典始传日本。6世纪初，又有百济五经博士段杨尔等到日本传授儒学，由此日本以五经为中心的儒家学问渐盛。古代日本的儒学等中国学问，许多是从百济人学到的。百济的贵族层，汉学相当普及，对经、史、文章、阴阳五行、医药、占卜等无所不通。

佛教传入百济比高句丽稍晚。384年，胡僧摩罗难陀自东晋到百济，第二年，百济“创佛寺于汉山，度僧十人”，佛教从此开始流布，并逐渐兴盛起来，进而